回归与超越：自然文本分析的重新认识 *

张杰　余红兵

摘要　符号学的使命究竟是揭示符号意义的感知及其表征，还是应该让意义生成回归事物本体，即返回自然，在瓦解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实现意义的超越？为回答这个问题，本文从两方面出发：首先，结合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相关思想，对新塔尔图符号学派的“自然文本”分析进行反思；其次，在此基础上，重申精神文化符号学的使命：着力摆脱被哈耶克批为“建构理性主义”的局限性，走出现存知识体系的羁绊，为超越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学习，提供值得借鉴的参考。

关键词　符号学　塔尔图学派　自然文本　精神文化符号学　理性主义

DOI:10.16238/j.cnki.rla.2023.03.001

长期以来，知识通常被视为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真理则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头脑中的正确反映。在这样的视域中，符号学的使命则是探讨知识和真理的表征，即意义的符号表达方式。然而，符号学界早已发现任何的符号意义表征又是徒劳的。符号表征难以避免“遮蔽”现象，并因此引发了“遮蔽”与“去蔽”的探索，从而导致了语言学转向。符号学的使命究竟是符号意义的感知及其表征，还是应该让意义生成回归事物本体，即返回自然，在瓦解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实现意义的超越呢？

围绕这些问题，符号学界展开了多维度的探索。索绪尔共时性语言学的“二分法”和皮尔斯逻辑符号学的“三分法”、莫里斯行为主义的“符号关系论”、巴赫金社会符号学的“对话思想”、克里斯蒂娃符义诗学分析的“互文性”、西比奥克生物符号学的“建模系统理论”等等，都是立足于狭义理性分析，努力在构建一种符号意义表征的模式。尽管罗兰·巴特的“零度的创作”、德里达的“逻各斯主义批判”或是海德格尔的“去蔽”等理论都曾尝试解构现存的符号表征体系，但这些依然是以狭义理性分析为基础的。显然，他们也很难走出以“有限”把握“无限”的尴尬处境，就如同人站在地球上很难离开地球一样。难道人类真的能够用有限的理性去把握无限的世界吗？我们认为需要以“无限”感知“无限”，以“自然”把握“自然的认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体裁演变史研究”（21AWW004）阶段性成果。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知方式”。这正是精神文化符号学[1]在当下所要阐发的核心问题。

人类社会已经走进了人工智能时代。机器学习不断超越作为个体的人脑，人工智能似乎大有超越人类认知的趋势。学界也开始认识到，仅仅沿着基于知识积累、逻辑推理、改造事物的轨迹继续前行，是远远不够的。在众多的探索中，返回自然就成为了一种极有价值的学术路径。比如，在世纪之交，塔尔图符号学派的研究重心经历了从“文化符号学”到“生态符号学”的转移，其中一个代表性事件就是“自然文本”（nature-text）[2](280)分析的提出。这个转移其实就是在探索返回自然的符号学研究路径，不仅显示出国际符号学界关注点的变化，也标志着符号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本文基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相关思想，对“自然文本”分析进行反思。我们认为，返回自然的关键在于走出狭义理性思维的桎梏，此二者互为因果。这种思路并不是走向无意义，而是为了意义的升华。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申精神文化符号学的使命：着力摆脱狭义理性的局限性，走出现存知识体系的羁绊，为超越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学习，提供值得借鉴的参考。

一、超越主体：“回归”与“升华”之间

在人类跨入21世纪门槛之际，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国际符号学界逐渐认识到，仅凭狭义理性思维是很难把握意义世界的，更无法与机器相抗衡。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不仅更便于对可以表达的“明知识”的汲取和应用，而且还能够不断发掘出无法表征的“暗知识”。因此，人类要超越自己创造的科学技术，就要另辟蹊径，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探索一条回归自然的生态发展之路。其实，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零样本学习”，打破人脑理性思维的局限，返回自然，回归到最初的学习状态，即元学习。

塔尔图符号学派在其领袖人物尤里·洛特曼去世之后，开始了从“文化符号学”（semiotics of culture）经由“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到“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s)的转向，也就是由以文化“符号域”（semiosphere）研究为中心，转向了对“圜境”（Umwelt）① 和自然的探讨。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研究对象的重心转移，或者是研究范围的拓展，其实这更是一种思维范式和探索方法的变更。早在20世纪初，雅克布·冯·乌克斯库尔就提出了“圜境”的概念。这一概念迥异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环境”是指绝对独立于认知主体的客观或客体世界，而“圜境”则是指一个主体世界，是生命体基于自身的感知系统而能获致和经历的世界。“没有生命，也就不可能有圜境。生命是以生命体为中心的，存在于它们的主体能动性（agency）之中；因此，圜境是单独的，是个体化的。”[3](650)同时，圜境又是一个生命体所能直接体验并与之交互的主体世界，也就是说，“圜境作为意义对

① 关于现代符号学中Umwelt一词的汉译，本文取余红兵《符号建模论》第三页脚注2中的译法。余红兵：符号建模论[M]，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象的世界，总是和另一个存在于生命体内部的相对物，即内境（Innenwelt）一起存在的。”[3](651) 因此，“圜境”不是消极被动的客体，而是积极主动的生命过程，既是自然界信息的发生器，也是符号表征的意义承载器，它与生命体形成一种和谐共奏的关系。[4](174)

“回归”自然或返回“圜境”，而并非以各种文化表征方法来确定符号表征对象的意义，这样可以避免符号意义的“遮蔽”，为阐释者“敞开”无限的可阐释空间。在这方面，新塔尔图符号学派“自然文本”的分析方法就是一种有益尝试。这个方法是由该学派的中坚人物蒂莫·马伦提出。马伦认为，“生态符号学研究的对象也应当被认为是双重的：除了讲述自然、指向自然的书写文本之外，它应该还包括自然环境本身被描述的部分。为使这二者关系成立，自然环境被描述的部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必定是文本性的，或者至少是可被文本化的。我将这两个相对物之间通过意义关系所形成的组合体称为自然文本。”[2](280) 在精神文化符号学看来，自然文本分析其实就是在文本的自然化与自然的文本化之间来探寻意义。前者指的是认识到文本是在圜境中，后者指的是将圜境中的意义对象物视为文本。这种交互关系不仅能够让我们从自然界角度出发来感悟到人类文明留下的进化痕迹，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摆脱片面知识体系的限制，走出狭义理性的羁绊。

那么究竟什么是狭义理性？我们认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的相关看法。他在三卷本巨著《法律、立法与自由》的第一卷《规则与秩序》中指出，“较为妥当的做法不是区分出‘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而是区分出建构论的理性主义与进化论的理性主义，或者按照卡尔·波普尔的说法，区分出幼稚的理性主义和批判的理性主义。”[5](29) 这里的建构论的理性主义，即是本文所言的狭义理性主义，可简称为建构理性主义。哈耶克对它进行了驳斥：“无论是在其事实结论还是在其规范结论方面，这个思想传统都可以被证伪……这个错误的观点与一个同样错误的概念紧密相关，那就是将人类思维看作是独立于自然与社会之外的一个东西，而不是催生各种人类社会制度的相同进化过程的产物。”[5](5) 狭义理性将“抽象性”视为只有人脑的意识思维才拥有的特性，然而事实上，远在某个活动出现于意识思维或语言表达之前，决定该活动的所有认知过程都有这种特性。这便是进化论理性主义的要义，或不妨说是广义的理性主义。

显然，生态符号学的“自然文本”分析在返回自然的同时，要摆脱的仅仅是建构理性主义，而并非进化理性主义。塔尔图符号学派的回归“圜境”和还原自然本身，就是要努力敞开人的认知空间，启发人类从各种不同的维度和方法来认识自然和事物本身。这条路径无疑是当代符号学探索的一大进步，为符号意义的释放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因为它体现的是符号学研究的关键任务，即在文本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之中，不断发掘文本的可阐释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空间。

然而，在精神文化符号学看来，仅仅如此又是不够的。“回归”自然并非目的，只是手段和方法，目的应该是为了“升华”，即揭示自然或圜境进化中蕴含的“智慧”。要做到这一点，基于西方文化传统的塔尔图符号学派又是难以做到的。精神文化符号学立足于东方文化语境，其使命是要超越认知的主体，即建构理性或狭义理性的局限。也就是说，不仅要跨越建构理性的藩篱，而且还要在进化理性的基础上，升华人的认知。

比如，佛教中的“转识成智”，就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思考路径。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哲学大辞典》明确阐释：“‘转识成智’亦称‘转识得智’。佛教用语。瑜伽行派和法相宗认为通过特定的修行，领悟佛教‘真理’，有漏（有烦恼）的八识就可转为无漏（摆脱烦恼）的八识，从而可以得到四种智慧。这四智是：（1）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转为无漏时得‘成所作智’（或称‘作事智’）；（2）第六识（意识）转为无漏时得‘妙观察智’（观智）；（3）第七末那识转为无漏时得‘平等性智’（平等智）；（4）第八识阿赖耶识转为无漏时得‘大圆镜智’（镜智）；此说亦是藏传佛教的重要理论。”[6](258) 事实上，佛教中的“唯识无境”与符号学中的“圜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把人类的“识”转化为“智”，也正是揭示自然或圜境所蕴含的“智慧”，从而“升华”人的认知。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庄子哲学思想中的“吾丧我”[7](19) 出发，也就是“吾”这个“大我”要消解“我”这个“小我”。人的“主体”只有与自然的“客体”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即把所谓“小我”的“主体”尽量消除，才可以达到无限自由的“吾丧我”境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经过“修行”，达到“用心若镜”[8](234) 的自由状态，才能在“吾丧我”的通明境界中实现意义的释放。唯有如此，狭义理性知识才能“升华”，超越一般认知的情商和素养才能形成。[9]

显然，走出建构理性主义的羁绊，避免符号表征的“遮蔽”，追求意义的自由，仅仅回归自然或“向外”转向客观世界是明显不够的，是很难超越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的，更要“向内”面对认知主体的自我。自我的认知主体是符号意义表征的发生者，缺乏“向内”就很难说清“向外”的表征。西方语言符号学界之所以陷入“语言的表征危机”，主要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二、追求自由：“向外”与“向内”之间

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总的说来有两大方向：认识自然和社会世界，和认识人的自身。前者“向外”，后者“向内”。二者殊途同归，最终的目的均是追求自由，在试图把握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过程中争取生存的自由，同时在对人的心灵世界的认识中获得思想的自由。以古希腊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就显示出“向外”与“向内”的融合，只不过这种“向内”更多是把人看成和自然一样的被认识客体，而并非是认知的“前提”，即主体行为的发生者。中国古代哲学确实更偏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重于“向内”，但这种“向内”与西方学界有所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人的认知行为发出前的准备状态来考察的。也就是只有首先解决了认识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前提，即“向内”的问题，排除了作为认知主体的人脑中的各种杂念，才能够更好地“向外”，甚至能够更深入地研究人的自身。因为只有认知主体自身进入了无干扰的自由境界，才能够在自然和社会世界里自由地驰骋。可以说，在中国哲学传统里，对自由的追求始于认知行为发生之前。

冯契（1915—1995）在《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一书中，就明确指出：“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一方面，要认识自然界（包括社会）的发展秩序，这就是天道与人道；另一方面，又要认识自己的心灵和德性。性和天道交互作用，构成了人类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辩证发展过程。”[10](329) 在这里，冯契不仅区分了人类认识的两个重要方向，而且也指出了从知识到智慧的辩证发展过程，即“转识成智”。他所说的德性，就包含了人在认知世界前的准备状态，只有没有杂念的、良好的德性，才能够实现知识到智慧的“升华”。冯契的这番论述，与其师金岳霖（1895—1984）的《论道·绪论》有着高度一致。金在此书中写道：“研究知识论我可以站在知识论底对象范围之外，我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研究元学则不然，我虽可以忘记我是人，而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我不仅在研究底对象上求理，而且在研究底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11](18) 这里的元学是指人的主体对自然或客体介入的一门学问。金岳霖在这里说的是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元学的智慧如何可能，也就是自由人格的培养问题。这就包括如何“得”，即怎样“转识成智”，实现由知识向智慧的飞跃；也包括如何“达”，即如何用语言和文字的符号系统把智慧表达出来。当然，“如何得”是前提和重点，没有“得”就谈不上“达”。

相较而言，从苏俄时期的符号学研究开始，到当今新塔尔图符号学派的生态符号学，无论是“符号体系”，还是“回归”自然的“圜境”及相应的自然文本分析，主要都体现为指向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向外”探索，即便有所“向内”，也是把人作为研究的客体来看待，而并不是认知行为的“前提”。比如，俄罗斯符号学家 Ю.С. 斯捷潘诺夫认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遍布各个领域——语言、数学、文艺，包括单部文学作品，建筑艺术、绘画设计，还涉及家庭组织以及各种下意识的活动，涵盖了动物世界、植物生长。然而，无论如何。符号学涉足的直接领域就是信息化体系，也就是信息传播系统，这一系统的基本核心就是符号体系。”[12](5) 生态符号学的研究也是如此。新塔尔图符号学派的领军人物卡莱维·库尔就指出，“生态符号学可以被定义为研究自然与文化关系的符号学。它涉及到自然之于人类的位置和角色的符号学维度，即自然对于我们人类的意义是什么或曾经是什么，我们怎样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与自然进行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沟通。”[13](350) 这一点可以通过生态符号学的理论渊源获证。生态符号学一方面源自索绪尔符号论 (semiology) 和结构主义，主要包括列维·斯特劳斯、洛特曼、艾柯、格雷马斯等人的理论，另一方面则源自皮尔斯与莫里斯的广义符号学（general semiotics）传统，集中体现在美国著名符号学家西比奥克（Thomas Albert Sebeok，1920—2001）所创立的动物符号学和生物符号学，也是把自然的符号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总而言之，这些符号学理论基本上是一种探索自然世界和社会的知识论研究方法，对人作为认知和符号表征的主体世界缺乏深入分析。

诚然，新塔尔图符号学派的生态符号学是返回自然的一门学问，但是很少涉及主体对客体的融入，依然还是停留在知识层面上的，缺乏对认知主体的整体研究。因此，它还算不上是金岳霖所说的元学，毕竟“知识论底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底裁判者是整个的人。”[11](19) 精神文化符号学则与金岳霖的元学立场高度一致。我们认为生态符号学及其自然文本的分析方法缺乏对认知主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精神联系的研究，尤其需要对认知主体自身展开深入研究。我们将符号学研究视为揭示人的精神文化活动复杂联系的重要手段，“以‘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认知模式为基础，从‘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个性化’的符号特征、‘自由化’的学术理想等维度，更加推崇人的自由，追求人与自然、个性与社会的‘和谐’。”[1](1) 不同的认知主体返回自然语境的状态，无疑是不相同的，但“和谐”的内在必然性是一致的，这一点也与乌克斯库尔“圜境”概念相吻合。若要让人可以自由地在自然界驰骋，或者实现人的圜境与内境的和谐共奏，首先就必须排除自身的“杂念”，必须做到庄子所说的“吾丧我”。

实际上，只有这样，人才能获得对自然的自由认知。自由认知的前提是首先要让认知主体处于自由境界，这样才能实现“名言之域”到“超名言之域”，才能够在自然中超越自然，在文化行为中超越文化行为，在社会世界中进入出世境界，从而获得超越知识的“道”。正如冯契所说：“不论是普遍命题，还是特殊命题，命题的真总是有条件的、有限的、相对的。而求穷通则要把握无条件的、绝对的、无限的东西。无不通也、无不由也的道，天人合一的境界，会通天人的德性，都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无限的，所以，这就是难以言传的超名言之域了。哲学当然有一部分属于名言之域，是用普遍命题来表达的，但哲学家作为爱智者总是要穷究第一因、穷究最高境界，要求会通天人，把握无所不包的道。”[10](331)

中国古代的智者提出了“为学”与“为道”之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14](132) 要实现“转识成智”，也就是由“名言之域”进入“超名言之域”，只通过“为学”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探索“为道”的路径，既要遵循“道法自然”的探索方法，又要进入“用心若镜”的“丧我”境地。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够超越人工智能的机器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学习。机器学习的本质是模拟和迭加，属于“名言之域“”，只是“为学”，而人之“为道”则属于“超名言之域”，可以获得“智”。

三、探索路径：“为学”与“为道”之间

“回归”自然、摆脱建构理性的羁绊、释放符号意义，已经成为新塔尔图符号学派的生态符号学及其自然文本分析的主要任务。较以“符号域”为核心、以确定符号意义为任务的文化符号学理论，这无疑前进了一大步。然而，它还是植根于古希腊哲学的西方学术传统，即对知识和外化真理的兴趣。该理论与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一起，构成了该学派当前的理论基础。乌克斯库尔与洛特曼的理论整合，被视为当代符号学的核心课题，其“任务在于发展出一套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工具，可以界定和说明一般符号学的范围，并可以作为符号学所有分支的基础。”[15](5) 因此，该学派当下的学术追求是以探索知识及其相关方法为目的，也就是“为学”。

反观中国思想传统，对自然的探索都并非局限于“为学”之径，即自然万物的知识范畴，而是“为道”。以先秦诸子的论道为例，根本问题并非自然知识的探究，而是一种对待自然的态度，一种存在的状态。比如在老子看来，不能够把自然知识与崇尚自然的心境混为一谈，对前者的追求反而会对自然心态造成负面影响。正如颜世安所说，“老子自然之道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向自然学习，汲取一种最高的智慧以改善人的生存状态。”[16](224)

与“为学”“为道”之分异曲同工，是熊十力的“量智”“性智”。“量智，是思量和推度，或明辨事物之理则，及于所行所历，简择得失等等的作用故，故说明量智，亦名理智。”[17](249) 这里的“量智”其实就是科学研究的道理，是求知的，也就如同老子的“为学”。张岱年解释其“作用在于从经验出发，对事物进行分析研究而获得知识，它‘恒妄计有外在世界，攀援构量’亦是一种向外求理的工具，亦能用在日常生活的宇宙即物理世界之内，而不能用以解决形而上学问题，所以不能实证本体，把握真理。”[6](734) 相比较而言，“性智”是“量智”相对，指的是人“‘真的自己的觉悟’。认为其圆满无缺，独立无匹；虽不离感官经验而又自在无碍，寂寞无形却又包含万理，为一切知识的根据。具有性智的人才能自明自识以认识宇宙和人生的真源。”[6](734) 显然，“性智”就类似于老子的“为道”。熊十力主张“智识合一”，也就是“性智”与“量智”合一，前者是体，后者是用。张岱年对此做了精辟解读：“量智虽原本性智，却缘一切日常经验而发展，‘迷以逐物，而忘见有外’，于是便障蔽了‘真的自己’，违背了性智。‘性智’与‘量智’之区分及其关系，类似理学‘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之区分及其关系。”[6](734) 熊十力确实更强调“性智”，他的论述实际上也解决了一直困扰西方语言符号学界的“遮蔽”与“去蔽”的问题，找到了“遮蔽”的根源，即“量智”障蔽了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性智”。

新塔尔图符号学派的生态符号学及其自然文本的“为学”导向，不仅体现在该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中，也体现在国外符号学的“科学化”中。比如，卡莱维·库尔就把符号学阐释为研究一切生命系统，即包括所有生物物种的符号活动（semiosis）的科学，并且可以作为大学的一门正式课程讲授。[18] 由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撰的高校教材《符号学》的第一讲就开门见山地指出：符号学“是一门关于符号和符号体系的科学”。[19](5) 确实，在学术探索和学校教育中，“知识”的探索和传授往往成为了科学家和教师的主要任务，也就是更加关注与“量智”相关的“为学”。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哈乔夫就曾指出过科学研究及其思维的局限性。他明确指出：“科学总是在探索规律性，科学首先注重那些重复、相似和共同的现象，而却很少关注个别的现象。”[20](3) 然而，通往“学”的道路相对研究不够，新塔尔图符号学派或许应该强化对认知主体的“性智”以及与此相关的“为道”研究。唯有如此，才能保障有效的“为学”。应该承认，国外思想家们在“为学”的方法论上，也不乏关于人的“智慧”问题的论述。比如，弗·谢·索洛维约夫就曾指出，智慧“不仅仅是指整个知识，还指道德完善、内在精神的完整性。”[21](179) 不过这种论述还是从“外在”的社会文化出发的，涉及的是道德规范对人的主体的制约，而并非认知主体自我的自然存在状态。

如果缺乏自然心境，没有排除“杂念”的研究者主体，“为学”的探索就很难实现，至少也是很受局限的。因此，“为道”是“为学”的前提，“性智”是根本，没有这个“本”，就谈不上“量智”的“用”。更何况，知识和真理又是在不断变化的，很难不受到社会文化权力场的影响，尤其是包括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知识领域。知识在助力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又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会限制和约束人的思维。因为人类是很难以有限的理性思维去把握无限的自然世界的。人类要超越自己创造的人工智能，只有着眼于“性智”，以“为道”使得认知行为发生者能够“用心若镜”，从而实现“转识成智”的目标。这个目标其实与老子道论完全一致，它们的“主要意图不在于回答世界‘是什么’。道的主要意图，是以自然无限性的启示，促人更新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向。”[16](236) 这种生存方式并非只是简单的接受知识和探索真理，而是要以崇尚自然、批判的姿态，瓦解现存的知识体系，回归自然。新塔尔图符号学派的生态符号学理论及其“自然文本”分析方法，无疑采取了返回自然的符号学分析方法，但依然是一种“为学”的研究，还算不上是“为道”的探索。这或许正是精神文化符号学的指归之所在吧。

参考文献

[1] 张杰、余红兵：反思与建构：关于精神文化符号学的几点设想 [J]// 符号与传媒，2021 年第 22 辑。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 Maran, T. Towards an Integrated Methodology of Ecosemiotics: The Concept of Nature-Text [J]// *Sign Systems Studies*. 2007. 35 (1/2).

[3] Magnus, R. & K. Kull. Roots of Culture in the Umwelt [A]// In: Jaan Valsiner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ulture and Psychology* [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4] von Uexküll, J. *A Foray into The Worlds of Animals and Humans: With A Theory of Meaning* [M]. Joseph D. O' Neil, tran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5] Hayek, F.A.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1, Rules and Order* [M]. Routledge. 1982 [1973].

[6]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 [Z],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7] 王先谦:庄子集解 [M],沈啸寰点校,中华书局,2012。

[8]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 [M],中华书局,2020。

[9] 张杰、余红兵:"用心若镜" 与符号意义释放 [J]// 江海学刊,2022 年第 3 期。

[10] 冯契:冯契文集(增订版)· 第一卷: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 [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11] 金岳霖:论道 [M],商务印书馆,2015。

[12] *Степанов Ю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Вводная статья В мире семиотики [A]// См.: *Ю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Степанов: *СЕМИОТИКА*: *Антология*.[C]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Деловая книга. 2001.

[13] Kull, K. Semiotic Ecology: 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 [J]// *Sign Systems Studies*. 1998. 26 (1).

[14] [魏] 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 [M],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2011。

[15] Kull, K. & Lotman, M. Semiotica Tartuensis: Jakob von Uexküll and Juri Lotman [J]//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2012, 6 (1).

[16] 颜世安:庄子评传:游世与自然生活 [M],湖南人民出版社,2022。

[17] 熊十力:新唯识论 [M],中华书局,1985。

[18] Kull, K., Silvi Salupere, S. & Torop, P. *Semiotics in Estonia [J]// Sign Systems Studies*. 2011. 39 (2).

[19] Никитина Елена Сергеевна. О предмете семиотики:является ли семиотика наукой? [A]// См.: Елена Сергеевна Никитина: *СЕМИОТИКА*. [C] 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06.

[20] 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Лихачев. Искусство и наука (мысли).[J]//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2. 3.

[21] Соловьев Вл. *Сочинения.в 2 т. Мысль* [M]. 1990.

Return and Transcendence: Revisiting the Nature-text Analysis

Zhang Jie　Yu Hongbing

Abstract　Is the mission of semiotics to reveal the percep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meanings of signs, or to return meaning-generation to the nature of existence so as to achieve the transcendence of meaning on the basis of unlearning? The present article approaches this question from two perspectives. First, applying insights from relevant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philosophical thoughts in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it reflects on the analysis of "nature-text" from the new Tartu Semiotic School. Second, it goes on to highlight some missions of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that is, striving against the limitations of what Hayek rebuked as "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 and breaking away from the fetters of the existing knowledge system, in order to create a reasonable alternative route that goes beyond machine learning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semiotics, Tartu Semiotic School, nature-text,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rationalism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多伦多都市大学人文学院）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